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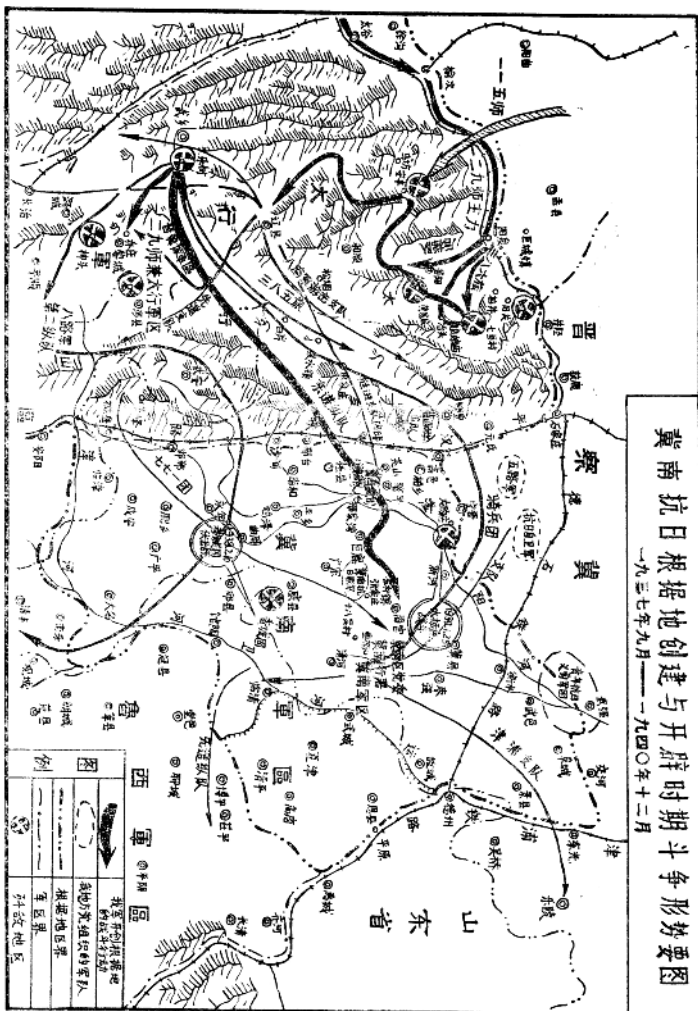
王光

躍聲南

陈祥达 王光
马耀红 张旭
石山 大 学 出 版 社
主 编

冀南抗日根据地创建与开辟时期斗争形势要图

一九三七年九月——一九四〇年十二月



前 言

《星光耀冀南》一书，写的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从1938年5月2日率主力部队开赴冀南，到1939年6月7日离开冀南去山东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开展河北、山东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与先期到达冀南的东进纵队陈再道、宋任穷一起，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艰苦卓绝的平原游击战争，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光辉业绩。

本书还原文照录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二九师对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徐向前撰写的《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以及徐向前、陈再道等部分当事人的回忆录等。这些都是当时冀南战斗生活的真实记录，是冀南抗日根据地创建时期的重要史料。

《星光耀冀南》一书，记述了我党领导冀南军民进行抗日战争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纵剖面，再现了徐向前、陈再道等一代英雄的群像。它不仅是一本珍贵的党史、军史和人民斗争史，也是一本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它象一支强有力的号角，鼓舞和鞭策后人勇往直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

在编撰研究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怀着对徐向前元帅无比崇敬的心情，实地考察了徐向前元帅等曾经战斗过的南宫、威

县等地。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参阅了邢台冀南革命根据地史编委会编写的《冀南党史资料》、南宫市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写的《南宫风云录》和北京冀南军区史编辑委员会编印的《冀南军区史记事》等。本书之所以能够出版，还承蒙南宫市委党史研究室、邢台地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冀南军区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莱阳农学院和石油大学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该书的编写由陈存达副教授发起设计，由陈存达、王吉清、马耀红、张旭日组织人员撰稿。全书分上、下两编。下编由陈存达、王吉清、马耀红、张旭日搜集整理，上编三部分撰稿者分别是（按编写先后为序）：第一部分王吉清副教授、孙绍芬、潘信芬、王继赞；第二部分陈存达、张旭日、刘春雷、李国梁、姜地友、袁玉清、嵇艳玲、陈爱芹；第三部分马耀红、于所芬、张正华、王仁高、刘建伟、刘文臣、冯艳品、高振芹。全书由陈存达统修定稿。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资料又不足，本书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4年5月

目 录

上编 综 述

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开创	(1)
(一)冀南概况	(1)
(二)“七·七”事变后的冀南形势	(2)
(三)东进纵队挺进冀南	(4)
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形成	(15)
(一)徐向前率部抵达南宫	(15)
(二)冀南平原创造“人山”	(17)
(三)首战威县，旗开得胜	(27)
(四)严惩汉奸，取缔“六离会”	(31)
(五)坚持统战，收编杂色武装	(40)
(六)扩大根据地，与范筑先协同抗战	(56)
(七)建立行署，初定大局	(62)
(八)会见卡尔德	(68)
三、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71)
(一)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形势	(71)
(二)进行反顽斗争，巩固抗日政权	(75)
(三)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坚持抗日民主 阵地	(87)

下编 史 料

四、历史文献	(115)
(一) 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	(115)
(二) 对平原游击战指示	(116)
(三) 关于冀南新政府成立后的工作指示	(117)
(四) 一二九师关于冀南反扫荡战术指示	(118)
(五) 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	(119)
五、革命回忆录	(126)
(一) 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节选)	(126)
(二) 《陈再道回忆录》(节选)	(154)
(三) 刘志坚 《我对冀南根据地初创阶段的回忆》	(206)

上编 综 述

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开创

(一)冀南概况

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是党中央关于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创建晋冀鲁豫根据地伟大战略决策和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

冀南，通指河北省南部。冀南根据地辖区虽有几次变动，但基本上保持在：西迄平汉铁路，东抵津浦铁路，北至仓石路，南跨漳河这一地域内，面积约28000平方公里，人口约800万。冀南平原地势坦荡，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棉花等，特别是棉花产量居华北之首，而且是制造炸药的重要原料，也是日本国内特别发达的轻工业——纺织工业的原料。

冀南地区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快在这里得到广泛的传播，建立了党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开展了小学教员联合会的斗争、学生运动以及1935年波澜壮阔的冀南农民武装暴动，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河北的统治基础。

冀南处在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之间，西靠太行，北

连冀中，东临山东，南接河南，腹地有运河、卫河、滏阳河、漳河等河流贯穿其间，公路网络也很密集，是联结太行、山东、冀中和冀鲁豫等根据地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为此，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一方面群众基础比较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可以破坏日军在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的交通运输，卡住日军掠夺资源、物资补充、兵力转移的咽喉要道，可以使我们在这块富庶的土地上立足生根，以冀南的人力、物力充实抗战力量，支援抗日战争。

（二）“七·七”事变后的冀南形势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部分军队进行了英勇抵抗，但由于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战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平津等地很快沦陷。日寇占领平津后，又兵分两路大举南侵，一路沿平汉线进攻河北、河南；一路沿津浦线进攻山东。地处平汉、津浦两线之间的冀南地区，很快成为抗日战争的前线。1937年9月间，保定、沧州失守；10月，石家庄、德州、临清、邢台、邯郸沦陷；11月，又失安阳、大名、邱县和威县等地。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冀南地区主要交通干线和重要城镇，先后被日军控制。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庐舍为墟，血流成河，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大惨案。1937年8月22日，日军飞机对景县狂轰滥炸，炸死、炸伤平民百姓300余人，12月12日，日军进攻藁城县梅花镇，残杀群众1547人，把一个繁荣富裕的梅花镇变成了一个血雨腥风、满目凄凉的屠场；12月24日，日军攻进成安县城，野蛮屠杀居民

5300多人，22户被杀绝，1200多间房屋被烧毁，制造了震惊华北的“成安大惨案”。

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还疯狂地掠夺冀南人民的粮、棉、肉、皮毛等农畜产品，以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以往普种粮食的冀南广大土地，大部分变成了日本的植棉区，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耕地沦为日本的军事原料生产基地。这不仅使冀南的粮食蓄积空虚，而且严重地影响到抗战部队的供给。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和经济掠夺，国民党军队及其党政机关仓惶南逃，冀南大部分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极端混乱。土匪、游杂武装、封建会道门等打着“抗日”、“保家自卫”等旗号趁机而起，一时间，“土匪遍地，司令如毛”。大者数千人一股，小者20~30人一股，共约120余股之多。如盘踞在隆平、南和、任县等地的刘磨头、邱庆福、时汝南等各有600人以上；在威县、邱县、临清一带的赵山峰、王来贤、冯寿朋等，各有千余人；在馆陶的吴作修、王金甲有千余人；在冀县一带的民军二路赵云祥、金庆江和景县一带的葛贵斋，各有1000~2000人左右；在临漳、成安一带的郭青、王自全、杨朝卿等，各有千余人；在故城一带的胡合道也有数百人。在武强一带还有一支由段海洲组织的“青年抗日义勇军团”，约有4000~5000人。与此同时，一些封建会道门组织也趁机而起，利用群众要求安定社会秩序的心理和封建迷信思想，迅速地发展起来，并多为封建地主、豪绅、政客所操纵。较大的会道门组织有“六离会”、“白吉会”、“大刀会”、“红枪会”、“二坎会”和“天门会”等。这些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武装和会道门组织各据一方，不断扩充地盘发展势力，时有火并发生，尤其

是一些土匪武装危害民众，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使外侮内乱交加，鸡犬不宁，冀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迫切盼望有人能够组织他们抗日救亡，消灭土匪。

1935年，冀南地区的党组织，领导农民举行的以“抗日反蒋”为旗帜，以分粮吃大户为中心内容的武装起义，曾遭到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保安团的残酷镇压。有些党员被杀害或被捕入狱，有些则背井离乡，隐名匿姓奔走他乡，党的组织几乎全被摧垮，党员由当时的5000多人减至200多人。但是党的英勇奋斗、造福人民的光辉形象，深深地刻在人民的记忆中。1937年7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马国瑞来到冀南，恢复党的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不久，冀南临时特委成立，后改为冀南特委。冀南特委高举抗日旗帜，团结各界抗日人民，在大名、内黄、磁县、南宫、威县等地，组织了几支抗日游击武装，这些武装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冀南党组织的恢复和抗日武装的建立与扩大，对抗击日寇的侵略，鼓舞人民的抗战情绪，阻止土匪骚扰，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建立冀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东进纵队挺进冀南

1. 工农红军改编，八路军奔赴山西前线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又大举进攻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日、救国的旗帜，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即7月8日，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党的号召得

到了全国人民和一切爱国军队的热烈拥护，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全国抗日救亡的怒潮。国民党政府被迫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于是，我党将陕北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后改为正、副总司令），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下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等三个师及直属部队。一二九师是由原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后改为政治委员，1938年1月由邓小平接任），副主任宋任穷，参谋长倪志亮。下辖三八五旅、三八六旅。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参谋长李聚奎，政训处主任王新亭。该旅下辖七七一团、七七二团。

改编后的八路军在朱德、彭德怀的率领下，于1937年9月，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前线，抗击日军。一二九师进入晋东北地区后，于10月19日夜袭阳明堡飞机场，击毁敌机24架，歼敌100多人。是月下旬，为配合国民党军队保卫太原，一二九师加入正太路方面的作战，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七垣村等地打击敌人，其中七垣村战斗击溃日军第二十师团的辐重部队，缴获骡马300余匹，歼敌400多人，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宣告结束。毛泽东在11月13日发出指示，指出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八路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八路军的任务在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争夺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并具体指示一

二九师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晋冀豫地区包括平汉路西、正太路南、同蒲路东、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为了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11月中旬，一二九师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开了干部会议，进行坚持华北抗战动员，具体部署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会议还发出了“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号召。石拐镇会议后，为了开辟辽县以东、平汉路邢台、磁县段及漳河以北的冀豫地区，刘伯承和徐向前商定派张贤约带领100余个连、排以上干部组成先遣支队，秘密进入冀南西部的沙河、邢台一带，了解情况，开展工作，并为后继部队筹粮筹款。先遣支队到达指定的地点后，发现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已经逃跑，许多县城尚未被日寇占领，群众抗日热情很高，有的地方还组织了抗日武装。

1937年11月下旬，先遣支队将冀南抗日斗争形势向刘伯承、徐向前作了汇报，刘伯承、徐向前认为冀南地区党组织基础较好，群众抗战情绪高涨，在这个地区建立和发展根据地的条件比较优越。一二九师和地方党组织立即召开会议，正式制定了“路东计划”，令孙继先、胥光义率领30多名营连干部组成挺进支队，进入冀南平汉路以东的任县、隆平等地活动，帮助周围各县建立抗日政权——抗日战地救国委员会，简称“战委会”，依靠1935年农民暴动中跑散归回的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建立了冀南抗日模范游击队第一支队。为了加强领导力量，挺进支队还抽调强有力的干部到第一支队任政治委员，向每个营派了教导员。抗战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挺进支队也由开始的30多人发展到300~400人。这进一步证明，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是完全有

可能的。1938年11月，一二九师又将七六九团的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和一个骑兵连组成八路军抗日东进游击纵队（简称“东进纵队”），由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任司令员、晋冀豫省委书记李菁玉任政治委员，挺进冀南，与地方党组织共同开辟抗日根据地。

2. 和平解决“巨鹿事件”

陈再道，湖北省麻城县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师第三团排长、连长，第十一师第十一团团长的，红四军副军长、军长。参加了长征。1938年1月15日，陈再道、李菁玉率领东进纵队500多名游击健儿出师太行，跨过平汉铁路到达隆平县（今隆尧县）的魏家庄，与孙继先、胥光义率领的挺进支队会合，准备进驻冀南的中心地区——巨鹿和南宫两县，并打算以此为基础，开辟整个冀南地区。这时，任县、隆平一带的土匪武装邱庆福、时汝南、刘磨头等部，正在巨鹿城西一带拉开架势，同王文珍、甄福喜、刘建三等为首的巨鹿县保安团火并。东进纵队首长陈再道经过对双方的分析，认为这些土匪武装虽然到处抢掠勒索，为害民众，但他们毕竟打的是抗日旗号，巨鹿县保安团的头头们，虽然在1935年和国民党军队一起镇压过我党领导的农民暴动，现在又与日寇建立秘密联系，正筹备组织“维持会”，但他们总还是中国人，还没有沦为公开的死心塌地的汉奸。因此，对双方矛盾加以调解，有可能使其纠正扰害人民或对日妥协的倾向，有利于共同抗日的民族大局。同时，双方已打了半月之久，势均力敌，谁也吞并不了谁，如果我军从中调停，双方均可“体面”休战。于是，我东进纵队首长陈再道等从

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对双方晓以抗日大义，从中进行调解。向他们揭露日寇“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指出团结一致打日本的光明道路，并表明我党我军“不念前仇，不记旧恨，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真诚态度。经过耐心地说服教育，双方均同意停火并接受了我军提出的条件：刘磨头撤出巨鹿县境，回到原来驻地；巨鹿县城要取消维持会，成立抗日战委会，保安团接受八路军改编，并欢迎我军进入巨鹿县城。“巨鹿事件”的和平解决，是我东进纵队到冀南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进一步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打开了我军进入冀南的大门。

3. 进驻冀南腹地南宫城

1938年1月27日，东进纵队开进巨鹿县城，随后成立了巨鹿县战委会，并将保安团改编为东进纵队第五大队。同时派人到刘磨头部进行抗日教育和改编工作。2月8日，东进纵队进驻南宫城。南宫，位于冀南地区的中心，是平（北平）大（名）公路上一个重要县城。这里交通方便，街道整齐，店铺林立，商业发达，素有“小北平”之称。东进纵队进城后，司令部设在城内北大街原“华兴公烟草公司”。接着，东进纵队帮助冀南地下党的领导机关，成立了中共冀鲁豫省委。此后，我军在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以南宫为中心，向四周各县扩展。

帮助各地建立抗日政权和团结，争取名目繁多的游杂武装走上抗日道路，是东进纵队在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时，日军正在从华北抽调兵力南侵，其在华北的兵力相对减少，东进纵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首先派出

部队在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积极在南宮县及其附近的新河、冀县、清河等县宣传我党的政策，建立抗日政府或“战委会”，改编地方团队，组织抗日自卫队、农救会、妇救会、青抗先、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其次，东进纵队在南宮稳定立足之后，又以先期到达的挺进支队为基础，加派一部分干部和部队，组成两个挺进队：一个继续在乎汉路东侧的隆平、尧山、宁晋、任县一带活动；一个由孙继先支队长、王育民政委率领的津浦支队在津浦路西侧的临清、夏津、高唐、恩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摧毁敌伪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与此同时，东进纵队又挥师向南沿邢临公路一线推进，对敌展开攻势，争取了日军清水部队威县警备旅高士举部反正，将其编为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

在我军节节胜利的鼓舞下，群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踊跃参军。东进纵队除收编了一些游杂土匪武装和争取伪军反正外，以两个老连队为骨干组成了东纵第一团，另一个以老连队为基础扩大组成为津浦支队，骑兵连扩大为骑兵大队。东进纵队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

冀南地区抗战形势的迅速发展，给东进纵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干部严重缺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东进纵队首长决定成立“冀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校长陈再道，政委李菁玉，教育长王蕴瑞。学员主要是冀南各县党的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校址设在南宮县原国民党县政府内。学校设有专职教员，东进纵队和冀南特委领导同志轮流给学员上课。主要学习内容有《游击战术》、《统一战线》、《群众运动》、《社会进化史》、《中日问

题》等。学员完全按军队组织系统编成，过军事生活。训练班每月一期，共办了两期。第一期两个中队，每队百人左右，第二期四个纵队，每队也是百人左右，两期共培训了600多人。学员毕业后，大都分配到各县工作，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游击队，建立政权和各种群众团体。这些干部在开辟冀南根据地的过程中，不少都成了骨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4. 冀南抗日军政委员会的成立

我军以南宫为中心，东向津浦、西向平汉路的发展，都取得了预期的胜利，但向北发展却遇到了困难。当时赵云祥的民军二路盘踞在武邑、衡水、冀县、景县和武强一带。赵云祥，原是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九旅教导队的一个队长。“七·七”事变后，第二十九军从华北前线溃退时，他收容了几百人，滞留在武邑一带，打着“抗日”旗号，收编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些散兵游勇和保安团队，部队很快发展到4000~5000人。赵云祥派人与国民党政府取得联系，被编为“河北民军第二路”，赵为司令，是当时冀南各种武装中人数最多、装备较好的一支武装。青年抗日义勇军段海洲部也有4000~5000人，是冀南又一股较大的武装，集结在安平县一带。赵云祥和段海洲为了扩充各自的地盘，发展势力，彼此时有武装冲突。因而尽快争取这两股武装力量共同抗战，或使其对我军暂保中立，不仅关系到南宫等县抗日政权的巩固，而且关系到整个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东进纵队进驻南宫后，陈再道立即提议由我、赵、段三方派代表举行会议，商谈联合抗日的问题。但这一建议因遭到赵云祥的拒绝未能实现。当我军已在南宫、新河、清河、

冀县一带展开，威震冀南时，赵云祥为了与我军抗争，迫不及待地想用武力收编段海洲部，不时向段部进攻。段海洲为了保存实力，想依靠我军同赵云祥作斗争，表示愿与我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战。东纵领导陈再道等便利用段海洲怕被赵云祥吞并的恐惧心理，表示支持他们参加抗日，并提出以陈再道的名义邀请赵云祥、段海洲来南宫举行三方会谈。段海洲立即表示同意，赵云祥虽然心里坚决反对，但他害怕我军与段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对他不利，因而，也不得不表示愿意参加会议。

1938年3月，会议在南宫举行。会上，赵云祥企图拉拢段海洲共同对付我们，以争夺领导权。段海洲为了自身的利益，当场揭露了赵云祥企图吞并他的阴谋。陈再道当即向赵云祥指出：“谁来领导抗日，就看谁抗日最积极，谁抗日最积极，人民就拥护谁。”接着，陈再道建议成立军政委员会，各部队由军政委员会统辖，不得扰乱地方，危害人民。段海洲支持陈再道的意见，并提出由陈再道作军政委员会的主任。赵云祥虽然心里不愿意，但又怕陷于孤立，不得不勉强表示同意。会议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军政委员会的成立，是我军在冀南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它加强了我军在冀南各类武装中的领导作用，使我党我军在政治上更加处于主动地位，对进一步收编改造各色武装，打开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加强冀南地区政治军事领导力量，迅速打开抗日局面，1938年3月19日，一二九师首长又派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骑兵团来到冀南。宋任穷，湖南省浏阳县人。1926年加